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走向亚洲的航踪

(京权)图字 01-97-1340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研文出版 19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

ISBN 7-80109-221-X

I. 近…

II. ①野…②张…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407 号

- ▶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 ▶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 ▶ 电 话 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 ▶ 印 刷 北京市星月印刷厂
-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208 千字
- ▶ 印 张 9.75
- ▶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4000 册
- ▶ 定 价 18.80 元

中文版序

这次,我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一书,作为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发现中国译丛”的一种在中国公开出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又非常光荣的事。

正像本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特别是近代、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在这期间,我同时对近代的日中关系史也极其关心。若要问其理由,不用说,这是因为在 19 世纪末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日中关系给中国的现实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在这种一般性的理由以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些更加切实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这就是,在从“日清战争”、“对华二十

一条”、“满洲事变”(九一八)直到“日中战争”这一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侵略的过程中,日本人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中国认识观走完了这条道路的?那些亲自从事着中国问题研究,或者深深地认识到与亚洲的邻国——中国保持安定关系的重要性并为此作了努力的人们,面对近代、现代中国的动向,他们是怎样认识,并在这样的时代里度过他们的生涯的?然后还有,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其中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呢?这些问题,对我这个从事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研究的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在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中,存在着一些很大的缺陷或者误区,对于战后才开始从事研究的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点检、将之意识化,我觉得这才是推动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试着对明治以来日本人的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顺着时代作了追究。在本书中,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意识或感情,而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们的中国观。这些知识分子,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想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对中国问题、亚洲问题积极地展开探讨的人们。我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些群像的思想苦斗的分析,才能究明战前日本的中国观或者日中关系中的本质性问题。固然,活动在历史时期的所有的人们,都逃脱不了那一时代的历史性制约,战前的历史,不能就此应用到战后来。但是,只有看清历史上连续的契机和断绝的契机,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现在,再一次回头阅读收入本书中的论文,感到内容上尚不充分的地方太多太多了。这些不充分的地方,不仅仅请日

本的读者,也恳请中国的读者不吝提出批评。尽管如此,本书可以说对近代日本所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观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如果它能够成为中国读者学习研究这一问题的一個辅助的话,那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望外的喜悦。

今后,为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我想在这一领域继续从事研究,同时,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愿意在日、中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学术性对话方面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最后,对为本书的出版不辞辛劳的蔡毅先生以及以精当的笔致翻译了本书的张学锋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野村浩一

1997年6月于东京

第 一 部

第一章

近代日本国民的使命观,其诸 类型及特质——大隈重信、 内村■三、北一辉

一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由国民使命(national mission)、国民传统(national tradition)、国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例如 F. Hertz, *Nationalit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1946. chap. I. esp. p. 18)。传统与一个民族的过去相连,利益与一个民族的现在相关,而“国民使命”则与一个民族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国民使命”这一

理念,对一个民族在认识自己民族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在寻找自己民族将来的奋斗目标时,有着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力,并且,这种影响力还非常强大。因而,当讨论近代日本“国民使命”时,我们不得不在考察国民传统和国民利益的同时来分析“使命”观的意识形态上的构造以及它的机能或者它的历史变迁。对于这一课题,完全可以针对以上提出的各个方面从正面来进行论述,但是,我却想避开这种从正面来进行讨论的做法,在本稿中,我将采用紧扣“国民使命”观这一主题,从另一个侧面来看问题的方法,想对近代日本的“使命”观的特质加以若干考察。

非常笼统地来看,亚洲的近代可以说是因近代欧洲的侵略而开始的。18、19世纪,西方诸列强的殖民地争夺战,其结果是将欧洲以外的世界——无论其愿意还是不愿意,都纳入了欧洲这个世界体系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是被欧洲强制性地拉入到欧洲世界中去的。所谓亚洲的近代,讲得极端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欧洲近代的一个反射。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可以这么说,亚洲的近代化即是近代西方逻辑在全世界被不断贯彻过程中的一环。反过来说,亚洲成为欧洲殖民地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了近代西方逻辑被贯彻这一史实。不管怎么说,亚洲的近代,不外乎是亚洲不断地失去自我的时代。

然而,在这样的亚洲近代史中,形成了一个唯一的例外,不用说,这就是日本。明治以后的历史,显示了我国近代国家的形成、完善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只有我国,才从沦为欧洲殖民地的危机中逃脱了出来,并且,虽然较欧洲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以近代国家的形象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登场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也就成了亚洲唯一的一个近代国家。

不过，如果根据上面所说的亚洲近代史的一般背景来考虑问题的话，这不用说，会有异常的危险和困难。堀田善卫氏极其简单地将这一背景模式化了，他说，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我国为了保全国家的独立，致力建设近代国家，从而成为亚洲的先驱，现实中也只能踏上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这条道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样一来，这一近代化过程，终于使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目，向亚洲诸国扩张自己的势力，走上了侵略之路。（堀田善卫的原话是：“如果不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话，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呢？怎样才能成为亚洲民族的盟友呢？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 19、20 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见堀田善卫著：《日本的知识》，载于《现代思想》讲座第 11 卷，岩波书店版。）

换言之，为了建设日本的近代化，我们就不得不学会近代西方逻辑——与之相关的逻辑，即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弱肉强食时代的西欧帝国主义逻辑——此外别无他法。这就是意味着用近代西方逻辑来否定亚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潜藏在近代日本国家命运中的一个基本矛盾。那么，潜在于近代西方与亚洲、亚洲与日本之间的这种矛盾，赋予了我国的国民使命观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同时为了超越、克服这一矛盾，我们又作了怎样的努力与尝试呢？本稿大体上想从这个视角来接近前面所提到的课题。当然，问题是极其复杂困难的，这里，我们可能最多只能找到一个进一步探讨这一问

题的线索而已。下面,我首先想从近代日本的国民使命观(我想这一使命观已经基本形成)的主流,即吸收“近代西方逻辑”这一方面来进行探讨,在分析这些问题以后,再想从与这一主流相反的方面,即对这种国民使命观的批判这个侧面来进行考察,可以说,想将这一课题限定在一个极其特别的视点里来展开。故而,想不完全受时代变迁的束缚,通过几种不同的形式,将重点放在这一使命观思想的形成过程上来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关于这一研究的方法,我想事先在这儿阐明一下。

二 日英同盟和大隈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明治时代的后半期,连续发生了日清战争(1895—1896)^①、北清事变(1900)^②、日英同盟(1902)、日俄战争(1905—1906)^③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我国在远东地区外交舞台上的稳固地位已基本上确立。日清战争,将亚洲的大国中国打败,日俄战争,将欧洲的强国俄国击溃,至此,我国从幕府时代末期以来的紧张感中渐渐地被解放了出来。明治时代前半期,我国外交上的最中心的课题是修改各种不平等条约,在这个外交交涉过程中,日清战争成了一个重要的机缘,由于这个机缘,我国实现了这一夙愿,成为亚洲

① 指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

② 指 1900 年八国联军进军北京事件。——译者注

③ 日俄战争时间应为 1904—1905 年。——译者注

最先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接着，又战胜了俄国，这一胜利，给亚洲各民族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和觉醒感，日本一跃成为东方的冠军，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幕府末期的紧张感中摆脱了出来，这种解放感，唤起了各种各样的与“国民使命观”相关的议论，这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以日俄战争为界，战争以前，可以说是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存活而拼命奋斗，战争以后，我国渐渐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宽裕，到了可以来考虑自己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理由的时候了。

位于远东地区的一个小国，废止闭关锁国以来仅仅过了半个世纪，现在一跃成为东方的冠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全面肯定明治以来的近代化过程的基础上，设定未来行动的目标，这恐怕是很容易想像的事吧。当然，由于日本近代化的早熟而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东西，在明治末年，已经引起了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怀疑。但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国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一步一步登场的实感，使得人们更加斗志昂扬。像“开国进取”、“取长补短”这样的明治初年的口号，在新的时代里，被更加具体地发展了。从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从日本的指导层口中，可以经常听到“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等语句。这里，我们可以把大隈重信（1838—1922）的“东西文明融合论”作为典型的例子举出来看一下。

大隈重信是明治维新以来“开国进取，取长补短”主义的代表者，其实，在他的心目中，“开国进取，取长补短”已极其卑俗化，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这位政治家，在确信了“日本早非日本之日本，实已是世界之日本”以后，这样说：“代表东方文明，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介绍至东方，我国即处于此等地位。”（《新日本论》，载于《经世论》大正元年版）据大隈之言，日

本在明治以后,已经是“足能经受(国际性的)生存竞争”了。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之所以能获得大胜,完全是“得力于我们过去数千年之民族素养及……遵守开国进取之大方针,锐意学习欧美文物制度,取其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这个结果,使我们国家顿时登上了“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的宝座。也就是说,日本占据了东、西两个文明的媒介者的地位。那么,日本的这种特殊的地位,赋予了日本一种什么样的使命呢?“成功地调和东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来人类之和平,谋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大隈几乎可以说是用这种天真的态度来唱说了他的东西文明融合论的。在大隈看来,只有这,才是我日本国的使命。时代赋予这个“世界之日本”的使命,就是融合西方文明的“文化革命”(Kultur Mission)。

这一使命之所以成为日本的使命,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之说明者”。然而,日本同时又是“东方文明之代表者”这一点,在使命观的意识构造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里我们有必要将这一问题再稍微挖得深一点。如果要问为什么有这个必要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因为这样做能够把与“国民使命”相关联的一些常用词,比如,“文明”、“文化”或者“东方”、“西方”等词语中所包含的内容,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一部分使之明确化。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大隈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西方的,而又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东方的。怀着这样的兴趣来看待当时的大隈时,“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这两个紧密相关的素材便浮现了出来。

众所周知,日英同盟是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在远东地区孕

育着危机的政治形势下,在与所谓日俄间进行协商这一外交路线进行了不断的较量,控制了局势以后,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缔结的。对于日英两国的结盟,大隈始终都非常积极。其实,早在日清战争结束的时候,大隈就表露出了这一构想。明治三十一年,隈板内阁时,任命加藤高明来担当这一交涉。在眼看这一同盟就要结成时,高兴之余,大隈冒着大雪,“首先拜访了外交大臣小村,祝贺大功告成,在归途中,又拜访了英国驻日公使麦克唐纳(Sir Claude M. MacDonald)^①,争先献上了祝词”,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二卷)那么,他对这一同盟抱着什么样的期待呢?对于政治家的大隈来说,其最大的企图大概是,在英、俄、德、法利害错综复杂的远东地区求得日本自己的安全吧。然而,在诸国中,大隈尤其想求得英国的提携。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隈的企图首先在于对中国的关系上。大隈针对日英同盟,这样说:

(如今,英国)极爱和平,已达到文明之最高点。(日英同盟就是)英国与东方勃兴之国日本以同等之权利,维持东方之和平,不使支那灭亡,无论如何将维持其现状,欲使支那之大市场均等面向世界——并非日英独擅其利,乃均等面向世界——开放之条约。为世界之文明,为世界之利益,此乃最有力、最有效之方策。(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东邦协会上的演说词)

① 括号内的西文姓名为译者所加,下同。——译者注

在大隈看来,“日英同盟”的效力只在于“支那保全”,而且被看成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构想中,可以找出潜藏在大隈心灵深处的几个理论根据来。这就是:(一)“东方勃兴之国日本”追求“近代西方”文明,其结果是,现在的日本在东方已经取得了能与英国比肩的地位;(二)与此相反,中国因为“无视世界文明”(《东西的文明》,收载于《经世论》),眼下,已面临亡国之深渊;(三)并且,在大隈看来,“世界之骚乱,一言以蔽之,乃为文明之不平衡所引起”,“高度文明国家之势力”,“通过诸种形式侵入低度文明国家”,由此而产生的抗争,“将激起波澜,亦会演化为战争”。从而,“协调文明高低之差,使世界各国国民之势力均衡”,此举“方为确保世界和平之良策”。(同上)这样,在大隈的理论体系里,日本与英国的结盟,直接与“支那保全”联系在一起,把东方问题的处理放进了日本与西方两者之间所缔结的关系中去了。

但是,这一构想与前面所叙述的使命观的构想不矛盾吗?大隈的图式要想成立的话,就不得不将文明一元论作为前提,也就是说,文明这个东西,就像“如水就低”一样,从“开明国”流向“半开明国”,并且,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化”。这里,如果更加历史地、具体地来说的话,那就是,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因此,在这种场合下,面对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东方文明”,在大隈鼓吹日本国使命的一瞬间曾被利用过,但是,在面对“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这些牵扯到东、西两方的现实问题时,“东方文明”就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初强调日本的“文明的媒介者”这一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许就是明治以来日本所采取的路线以及作为这一路线的投影——使命观

的一个典型事例。

大隈从英国那儿学来的东西，就是完全根据“近代西方”的模式来进行文明开化，“白人之负担”(white man's burden)这个词能够代表他的这种文明开化方式。所谓日本是“西方文明之介绍者”，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日本最完美地吸收、消化了西方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成了“东方之代表者”。也就是说，在依照近代西方的逻辑而设定的坐标轴上，日本，是能够占得一席之地之唯一的一个东方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是作为“西方文明之介绍者”的同时，又成了“东方之代表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日本即使能成为东方的代表者的话，也绝对成不了“东方文明之代表者”，倒不如说，日本不过是东方世界中西方文明的代表者而已。从而，我们把“日英同盟”与“支那保全论”这两者的结合，看成是想完全模仿西方的方式来向中国渗透，看来并不过分。主张为了世界的和平而“保全支那”的大隈，最终走向了把对华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的道路，这太具象征性了。当然，在国际关系这个真正的政治舞台上，日本其实很早就采用了西方人的手段，一方面还在努力争取修改本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一方面就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朝鲜(日朝修好通商条约)，这些史实，至今尚被人们屡屡提及。在这里，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大隈一边站在当时日本的立场上谋取国益，一边又把“东西文明融合”的使命作为日本国的天职，这与其说是他超越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背离这一高度，倒还不如说这是他难以隐瞒的虚伪或伪善。大隈所谓的使命观的本质，在这儿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吸收西

方文明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明治以来,日本在东方殖民地化的危机中,一心追求自己的“生存逻辑”,最后,日本把西方式的“生存逻辑”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而成了西方文明在“东方之代表者”。但是,将所谓的西方文明的“生存逻辑”就这样拿来作为东方国家日本的“生存逻辑”,不用说,是不可能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即使在近代西方的逻辑中能站得住脚跟的话,在正因为这一逻辑而日益受到生存威胁的近代东方世界里,却是行不通的。近代东方,必须有自己的生存逻辑。然而,正是日本已经成了“世界之日本”,在这个世界里,日本的使命——日本的生存逻辑被提出时,大隈用最容易的方法,僭称“东方文明之代表者”,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逻辑”。这时的日本的“生存逻辑”,说到底,仅仅是借用了“东方文明”这个词,这不过是一件饰物而已。说到这儿,“东方文明”是什么?不,“文明”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批判中,潜伏在文明中的悲惨、虚伪就再也明白不过了。

日本无趾人大隈重信(大隈曾遭武装袭击失去一脚,故言。——著者注)尝演说亚洲事,支那人、印度人皆往听。无趾曰:“亚洲文明之国,今以日本为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伦、印度辈,往日文化虽可观,今则不足比较。”……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固无往而不抵牾。假如印度得独立,一战遂胜英人,文化高下,未必遽胜于昔。窃以无趾闻之,其论意当与今异矣。人性固多有侈慢者,亦多有猥贱者,侈慢、猥贱,二者兼存,令得良医诊其神经,不知作何形状也。(《印度人之观日本》,《太炎文录初

编》。岛田虔次著：《关于章炳麟》（下），收载于1958年6月《思想》。此文后收入岛田的《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筑摩书房1965年10月版。着重号为著者所加，下同。）

当时，正住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家章炳麟（1868—1936）称，大隈嘴里的“东方文明”，其与真正的“东方文明”名不符实，而且，大隈所理解的“西方文明”，根本就配不上“文明”之称。章炳麟的“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一句，就是最尖锐的揭露。

我们也许把话题过多地集中在政治家大隈的身上了。大隈被中江兆民（1847—1901）讥为“投机商”（《一年有半》），在知识阶层中，大隈屡屡被贬为“肥后之俗物”^①。对于这样的一位政治家的使命观，若要求他有严密的理论或坚强的信念什么的，反而或许是不妥当的。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大隈给日本提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因而，探讨大隈的使命观的实质，说不定比我们预想的要重要的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展现当时日本人使命观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日本的使命观中的误区。对于战前的日本人来说，在考虑中国问题时，能完全突破“文明国家日本将文明传播到非文明之支那去”这个框框的人有吗？同时，把“这对中国具有何等意义”，“日本对东方担负着何种使命”这样的课题追究到底的想法，真的存在吗？当时，放弃了自己寻找自己的“生存逻辑”的努力，简单地借用“东方文明”的日本，或多或少，没有一天不被这种虚伪的意识

① 肥后，日本古藩国名，今九州熊本县，大隈的出生地。——译者注